

# 第一章 引 论

## 提 要

修辞活动是言语交际审美过程复杂运动的产物。它始终以双边活动的性质，使修辞信息的表达者和接受者通过对方确证自身的价值。表达和接受构成修辞活动的两极，二者统一在同一的言语交际过程中，又各有不同的角色分工。表达者提供获取言语交际最佳效果的可能性，接受者完成由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接受不仅实现表达的价值，而且对表达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接受既是修辞活动的结果，也是它的前提。没有前提，修辞信息无需输出；没有结果，修辞信息等于没有输出。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以争取“最佳交际效果”为目的的修辞活动，却冷落实现这一效果的修辞接受者，等于越过未完成的交际过程，去谈尚未实现的交际效果，这是一种理论的疏漏。

- §1.1 变换一种视角
- §1.2 修辞活动的两极
- §1.3 修辞活动中的角色关系
- §1.4 修辞接受的意义
- §1.5 简单的说明

## § 1.1 变换一种视角

本书的写作动机，首先是出于一种遗憾：我们注意到，国内迄今为止的修辞学研究，表现出明显的理论倾斜：研究者的目光，过于集中地投向了修辞信息的表达者，或修辞信息的物质承担者（话语材料）而冷落了修辞信息的接受者。

虽然，广义的修辞学研究范围已经相当宽泛，以致理论界有人提醒：修辞研究不要超出了自身的边界。但是，即使涉嫌失之宽泛的修辞研究，也只能大致归入两个研究方向：

a) 修辞表达

b) 修辞现象

在可以见到的大量有价值的修辞论著中，修辞信息输出和修辞话语本身，频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相形之下，作为修辞活动重要一环的接受，却是被委弃的灰姑娘。

对中国修辞学史的简单回顾，加深了我们的上述印象。虽然，中国修辞学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但是直到南宋陈骥《文则》问世之前，只存在片断的修辞理论，而没有较系统的专著。《文则》的出现，一方面标志了中国修辞理论由零星表述走向系统研究；另一方面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规定了中国修辞学的研究模式。该书所论修辞原则、修辞手法、文体风格、修辞和语法的关系等问题及其研究视点，不仅影响了《文则》之后的古代修辞学研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现代修辞学研究。后者丰富的研究成果，不断发展、深化着中国修辞学理论，但研究者的着眼点，还是基本上没有离开修辞话语的表达者和修辞话语本身。

中国现代修辞学研究始于本世纪初。随着《修辞学发凡》的

问世，耸起了醒目的高峰。关于这部中国现代修辞学开山之作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影响，修辞界不乏精到的评价。我们无意再去滥制续貂的狗尾。面对《修辞学发凡》严谨的理论体系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仰视修辞界一代巨擘伟岸的身躯，我们在崇敬之余，也想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也许正因为高峰的不可企及，使《修辞学发凡》之后近半个世纪的修辞研究在总体格局上没有大的改观——在《修辞学发凡》的旗帜下芸集的学者们很难超越自己敬仰的旗手。

十年浩劫出现了人所共知的文化断层。此后在修辞研究断裂带重新起步的学者们，共同迎来了理论的复苏和学术的繁荣。但这种复苏和繁荣，好像还没有导致研究思路的逆转：浏览一下专门化的修辞刊物《修辞学习》和各修辞学会的专题论文集《修辞学研究》以及几套影响广泛的“修辞学丛书”其间叠现着学者们辛勤忙碌的身影，但目光所及，似乎仍然没有超出修辞表达和修辞现象的研究框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国内外修辞学新老研究成果的《修辞学词典》和《汉语语法修辞词典》所收条目和释义内容，也从一个侧面不同程度地印证了修辞学研究领域的不平衡现象。以话语交际双方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书中的分析论证，也是侧重表达，涉及话语接受的问题，则语焉不详。接受作为言语交际的重要环节，其理论位置被挤压了。可以这样说，中国修辞学以表达和话语材料为中心的研究思路，始终没有变化，即使对国外修辞著作和修辞学家的译介、评述，也没能超出这种思维定势。在修辞研究巨大的声浪中，偶有一、两声“解码”研究的呼喊，也被“编码”和“代码”研究的合唱淹没了。

研究者习惯于从表达和话语材料的角度，去描述修辞手段、分析修辞现象、探讨修辞规律，作为一种研究思路，本身无可厚

非；作为一种实绩，也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只重视表达者和话语材料而忽视接受者，毕竟给完整意义上的修辞学研究，留下了未被理论之光照亮的一隅。

有前人疏漏的角落，才有后人涉足的空间。本书所作的投石问路的探索，将从对于这种理论疏漏的思考开始。它的一个认识基点是：修辞活动是表达和接受互为对象的双向活动。

## § 1.2 修辞活动的两极

一般的修辞学理论把‘修辞活动’看作对言语进行加工、修饰和调整，以达到最佳交际效果的活动。不管是学科词典释义，还是修辞专著的阐述，对修辞活动的理解，似乎都没有超出上述定义范围。这种理解，隐含了一个容易被人们忽略的矛盾：它承认修辞活动以达到最佳交际效果为目的；同时认为修辞活动以对“语言进行加工、修饰和调整”为手段。这里，手段悄悄地否定了目的。因为交际活动必须是双向的，它意味着言语交际双方对特定修辞信息的共同理解。但是对言语的加工、修饰和调整，显然没有接受者的介入，而只是表达者的独角戏。似乎修辞活动就是表达活动；似乎进行修辞活动的主体仅仅是表达者。其实，表达者选择和运用各种有表现力的语言手段，并不仅仅是为了自悦，而是既自悦，也悦人。只有当表达者确认某种表达手段效果最佳的时候，他才会进行自认为‘最佳’的选择。追求‘最佳效果’对表达者来说只是愿望，而不是现实。在“话不投机半句多”的言语交际中，表达者未必没有追求最佳交际效果的愿望，但他缺少接受者的有效合作，因此愿望没有实现的可能。社会语言学常识告诉我们：人们是“在合作中（因为所有的行动都

是社会的行动），经过符号的中介传达明确的意义而进行交际的。”<sup>①</sup>沙夫所说的合作行为，在美国哲学家格赖斯的合作原则中表述得更为详细。后者规定了言语交际双方在数量、质量、关系、方式四个方面必须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以确保交际畅通。

既然言语交际是一种合作行为，那么，以提高言语交际效果为目的的修辞活动，就不能不是表达者和接受者共同参与的活 动。表达和接受构成修辞活动的两极。二者互为因果，各自通过对 方确证自身的价值：修辞信息通过表达者的语言能力，转化为语言行为 外显为物态化的话语材料，然后作用于接受者 接受者以给定的话语材料为对象，遵循一定的言语交际原则，调动自己的知识库存，以自己对于表达者输出的修辞信息的理解，证明交际效果的相对优化。由此可见，所谓最佳交际效果，在表达者那里，只具有可能性；在接受者那里，才具有现实性。而把修辞活动的主体限定在表达者一方，实际上取消了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的界限。

类似失误 也表现在关于‘修辞过程’的既定看法中。

学科词典和一些修辞专著对修辞过程阐释不完全一致，但实质相同：都认为修辞过程是对言语进行选择、加工的活动过程。理论一方面强调通过言语选择、加工、调整，争取最佳交际效果，另一方面却冷落实现最佳交际效果的接受者。这等于越过未完成的交际过程，去谈不可能实现的交际效果。由于缺少接受环节，修辞过程便成了只有编码，没有解码的过程。或者说，是过程的中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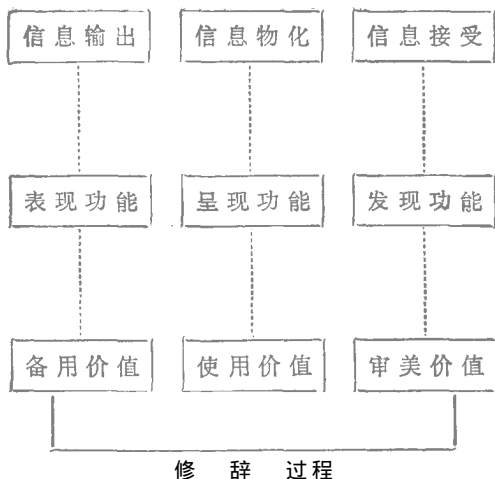
在我们看来，修辞信息等于语义信息加审美信息。<sup>①</sup>修辞活动既是言语交际活动，也是审美活动。是言语交际审美过程复杂运动的产物。为此，本书把“修辞活动”重新定义为言语交际双方共同创造最佳交际效果的审美活动。

表达者对言语的选择、加工和调整，固然是为了争取言语交际的最佳效果，但表达者的言语行为只存在于编码活动中，它的修辞效应，产生于解码活动中。从编码到解码，才构成完整的修辞过程。

修辞作为过程，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它的相对完成，不在表达者方面而在接受者方面。人们通常所说的“说完了”或“写完了”，并不意味着言语交际的阶段性的结束。相反，它是言语交际真正意义上的开始。在表达者来说，“完成”了的话语序列是有待于接受者进一步完成的物质形式。表达者将不定形的心理现实，转化为定型的物质现实——形式和意义都固定化的语符链。接受者将物质现实再度转化为自己的心理现实。使本来属于表达者的经验意识，在接受者审美心理结构图式的作用下，成为接受者自身的经验意识。这是一个双向对流的信息运动过程。

从以上认识出发，本书把“修辞过程”重新定义为“修辞信息丛输出到接收的运动序列”。它分为三个不同的运动阶段、具有三种不同的功能区分、对应于修辞信息三种不同的价值。示如下图：

在特定语境中，修辞信息也可以只有审美信息，而无语义信息。散曲中的衬字、民歌中的衬音等，多属于这种情况。如民歌《北风吹》唱词“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句中“那个”不携带语义信息，但具有审美意味。该语列中“那个”的衬入，属于修辞手段。这种修辞方式在现代有些叙事性作品中也有用例。如何立伟的小说经常借助衬词传达柔化的语言情绪，使一般情况下急读的语流，转化为慢咬缓发，时值延长的音流，增加文体的飘逸感。参见谭学纯、唐跃《语言情绪：小说创作主体的精神外化》，《艺术广角》1987年第3期。



我们用具体的修辞分析说明上面图示的修辞过程：

浮云游子意，  
落日故人情。

——李白《送友人》

从修辞角度看，上引诗句最佳交际效果的实现，可展开为以下的过程：

a) 在修辞信息输出阶段，语言材料用以传递表达者的意图和相应的情感状态：一种漂泊感和对故友的依恋。这种修辞信息借助两组不同质，但具有某种内在关联的意象，平行安置在一个给定的语法框架中。表达者将利用这一言语形式，开始他的信息传递活动。或者说，开始他的语言表现活动；

b) 在修辞信息物化阶段，信息内容从表达者的观念形态，转化为直接呈现的物质形态：游子的漂泊感和对于故友的依恋由所指转化为能指，在书面上呈现为一个一维的线性语流。原

先看不见、摸不着的表达者意图和相应的情感状态以方块字的排列形式呈现出来。语言功能由信息输出阶段的表现 转为呈现；

c) 在修辞信息接受阶段 信息内容的可理解性和接受者的理解能力相切合。因此 尽管没有一个连系动词将“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固定在一中特定的审美关系中 但是接受者的言语经验和审美经验却帮助他进行审美体验：浮云的漂游无定和游子的漂泊无根，以及日之将落和故友难舍的依依之情，在接受者的类似审美发现中获得了可接受性。语言功能则由上一阶段的呈现 转为发现。<sup>①</sup>

与此相应：

当修辞过程处于语言表现环节时，语言材料属于未及外化的内语言形态 只存在于表达者头脑中 只具有备用价值；

当修辞过程处于语言符号的物质呈现环节时，原先表达者头脑中的内语言形态，转化为直接作用于接受者的外语言形态，思想借助外部语言 转化为直接现实：“浮云游子意 落日故人情”作为可感和可见的物质载体 已经不再是表达者语言库存中的备用材料 而是由备用进入了使用过程 由此产生了修辞信息的使用价值；

当修辞过程处于接受者的语言发现环节时，使用中的语言材料进入“产品流通”过程 围绕上引诗句 接受者审美经验的碎片纷纷向一个轴心聚拢，修辞信息在这个环节实现审美价值。。

也许 我们的分析会招致一种误解：人们或许认为 在具体的修辞活动和修辞过程中，施受双方是一对连体婴儿，无需分

① 关于语言表现功能、呈现功能和发现功能的区分及其理论依据 参见唐跃、谭学纯《语言功能表现+呈现+发现》，《文艺争鸣》1987年第 6期。

② 谭学纯、唐跃《新时期小说语言变异的功能拓展》区分了语言的备用价值、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 基本理论也适用于本文。见《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 2期。

割也无法分割。当一种修辞现象被成功地阐释了的时候，接受活动就已经包含在这种阐释中了。因此，对于修辞信息的接受，实际上就存在于对修辞现象的描述之中。

如果真的存在这种误会的话，那么，在这种认识止步的地方，恰恰是我们思考的起点：

首先，表达和接受虽然统一在同一的言语交际过程中，但毕竟各有特点。作为修辞活动的角色分离，二者应该分别考察。在口语修辞中，表达者一方面进行口腔器官的肌肉运动，另一方面可能运用体态语进行辅助交际；接受者一方面由对能指声音信号的听觉分析进入语义理解，另一方面可能通过对体态语的视觉形象分析进入语义理解。在书面修辞中，表达者把所指转化为能指，接受者把能指转化为所指。表达者希望被理解，并把被理解的希望寄寓在他的编码行为中，接受者希望理解，并把理解的希望消融在他的解码行为中。但编码和解码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实际的情况往往是：

- a) 表达 = 接受 (信息接受等值)
- b) 表达 > 接受 (信息接受减值)
- c) 表达 < 接受 (信息接受增值)
- d) 表达 ≠ 接受 (信息接受改值)

这是因为，从表达到接受，经历了不同主体的两次主观介入。输出的修辞信息，渗透了表达者的审美感情，接受者则使在表达阶段已经审美化了的修辞话语，再度浸染自己的审美体验。表达和接受统一在同一修辞活动中，但二者的区别是客观存在。忽视这种客观存在，是理论的钝化。

其次，对于修辞现象的分析，虽然包含了接受的因素，但毕竟不能以存在于修辞分析中的接受因素，取代对于接受活动的理论阐释。现象的存在，不能证明对现象的本质认识。科学的

目的，是促成现象的自在性，转化为理论的自为性。即把自发的现象，上升为自觉的理论。可惜，理论恰恰在现象面前停驻了。或者说，迄今为止的修辞理论，还不曾对接受活动提供哪怕是微弱的理论之光。修辞过程中复杂而又微妙的接受现象，在蓬蓬勃勃的修辞学研究领域，成了待开垦的处女地。

也许，人们可以援引古人的论述，来证明接受修辞并不是一片空白。的确 南朝刘勰提出过“披文入情”“沿坡讨源”汉代董仲舒有著名的“诗无达诂”说，早在先秦，孟子就主张“以意逆志”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则见之于《易经·系辞》。其实 古人的这些论述，仍然属于一种现象描述。它是感受性的，不能视为科学性命题。它缺少科学性命题必不可少的逻辑论证，也不具备对于复杂的接受现象的解释力。更何况，上引论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艺学方面。尽管修辞学家多所引述、修辞史家多所诠释，但这些零星思想，距离一个理论体系还很遥远，本书的探索，不仅希望对接受现象进行细致的描述，更希望能够对现象背后的理论作尽可能深入的阐明。

### § 1.3 修辞活动中的角色关系

可以抽象出修辞活动中三种不同的角色关系：

#### 1) 一对一的角色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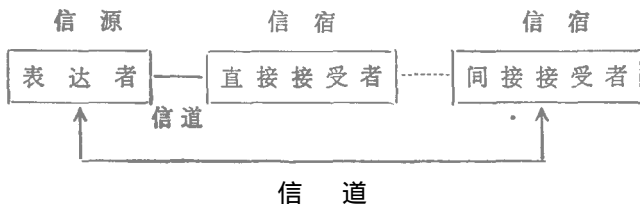
由一个表达者、一个接受者构成。口语交际中 两人之间的直接交谈，<sup>①</sup> 书面交际中，两人之间的通信等，在不公开两人之间言语交际内容的情况下，角色关系都是一对一的。如果两人

<sup>①</sup> 口语交际中存在群体表达（如齐声朗诵）一人接受或一人表达 群体接受（如众人听说书、演说）但角色关系仍是一对一的 因为这里不存在表达——接受过程中的其他中介环节。

之间的谈话被录音播放，或被发表；两人之间的通信被公开，则意味着一对一的角色关系不再成立。在一对一的角色关系中，表达者和接受者都是真实的。即施受双方都是现实存在的人，而不是虚拟的对象。同时，从信息传输，到信息接受是直接的，没有其他的中介环节。

## 2) 一对二的角色关系

由一个表达者、两个接受者构成。如前引“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句诗题为《送友人》因此“友人”和本诗的读者作为两个不同性质的接受者，共同参与同一言语交际过程，并与同一表达者构成了双重角色关系。其中“友人”是直接接受者，读者是间接接受者。从信息论的角度说，一对二的角色中，包含一个信源、两个信宿、两个信道：



上述角色关系中，表达者和间接接受者是真实的；直接接受者有可能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是虚拟的。以《送友人》为例，如果送别的对象实有其人，那么友人作为直接接受者就是真实的；如果友人是作者虚构的人物，或经过艺术概括的典型，那么他便是虚拟的直接接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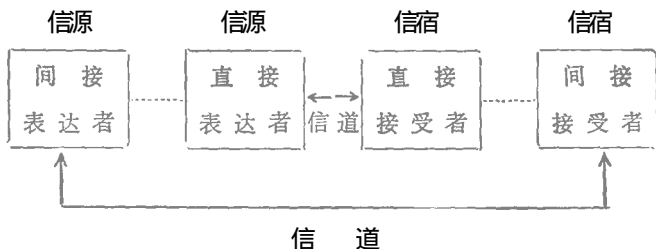
## 3) 二对二的角色关系

由两个不同性质的表达者，和两个不同性质的接受者构成。下面的例证分析可以揭示这种角色关系：

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 ——鲁迅《孔乙己》

直接发出上述话语信息的表达者 是鲁迅小说《孔乙己》中的主人翁孔乙己，他的直接接受者，是一群围在孔乙己身边，希望再分吃一点茴香豆的孩子们，因此，孔乙己和孩子们，构成一重角色关系——直接的角色关系。而小说的作者鲁迅，和这篇小说的读者构成另一重角色关系——间接的角色关系。这里 信源、信宿、信道都是两个：



间接角色关系中的双方是真实的，直接角色关系中的双方是虚拟的，后者是小说作者为特定主题情境而设计的角色。

区分修辞活动角色关系中的直接表达者和间接表达者，以及直接接受者和间接接受者，并不是对于西方文学接受理论的简单摹仿，而是从修辞活动自身规律出发的：不同的角色关系，在不同的层面进行言语交际；不同的接受者，在不同的接受语境中实现话语的意义潜能，其间包含着复杂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是以往的修辞研究从未关注，而本书不打算回避的。

例如，在二对二的角色关系中，最佳交际效果的实现，就比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接受要复杂得多。当孔乙己说出“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的时候，我们不能认为这个话语片断有可能被孩子们最佳状态地接受。因为表达者忽视了接受者的年龄特征，也没有充分地考虑自己选择的言语形式，是否具有可接受

性。孩子的语言思维决定了他们对“之乎者也”之类的古董不会产生很强的认同心理。但是，在孔乙己和孩子们构成的直接角色关系中不成功的信息交流，却在作者和读者构成的间接角色关系中取得了成功。作者之所以借一个虚拟表达者之口说出这类语言古董，并不是希望与孔乙己直接对话的孩子们理解这个话语片断的修辞信息，而是借此表现病态社会中异化了的小人物的悲剧：以喜剧的言语形式（仅指孔乙己的语言，而不是全篇小说的语言），体现悲剧的内核。借孔乙己令人发笑的语言，把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借孔乙己令人落泪的生命归属，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便是作者的表达动机。当真实接受者以自己的方式接通了信道后，便实现了意义潜能。因此，上引话语片断，是超越直接角色关系中交际效果的“欠佳”实现间接角色关系中交际效果的“最佳”。

## § 1.4 修辞接受的意义

在修辞过程中，接受者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接受者作为言语交际的一方，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显示其重要性。

### 1) 完整表达 需要接受者解码

“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马克思的这一著名论断同样适用于人类的精神生产。修辞活动作为人类主体精神的自我实现过程，同样是在消费（接受）中才得到最后完成的。当接受者的言语经验能够使他把握给定修辞话语的语义时，表明言语交际是畅通的；当接受者的审美经验能够使他给对给定修辞话语作出审美反应时，则表明了相对意义上最佳交际效果的实现。反过来说，实现最佳交际效果的可能性大小，以接受者言语

经验和审美经验的丰富程度为前提。在具有足够的体验能力和阐释能力的接受者看来，“浮云游子意 落日故人情”的修辞信息十分丰富。但是在体验能力和阐释能力贫乏的接受者看来，情况可能完全不同。如果接受者对中国古诗语言组织方式缺少基本的认识；如果接受者对汉语作为一种不显示形态变化的分析型语言缺少常识经验；如果接受者不了解中国古代诗人的观物运思态度；如果接受者对上引话语序列中的语象及其审美关系，不能产生相应的审美体验，那么，这个话语片断的交际效果不可能最佳，甚至不可能实现。

### 2) 省略表达，需要接受者补足

人们常用“言约意丰”、“言有尽 意无穷”来称说表达的成功。它以简约的话语形式，传递繁丰的修辞信息，其极端形式，是“不著一字 尽得风流”在口头 呈现为表达者的沉默 在书面，呈现为不设文字或借助省略号，制造修辞意义的空白。

问题是 面对“言约意丰”之类的修辞现象 理论似乎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思辨 从“言约”到“意丰”从“言有尽”到“意无穷”从“不著一字”到“尽得风流”经过了同一的转换程序 这种转换是由接受者完成的。繁丰的修辞信息，由于简约的言语形式的限制 无法完全外化出来。表达者的成功 只在于以浓缩的语流 甚至以无当有的方式，给接受者提供了扩展思维空间的可能性。他离不开接受者的有效配合。当接受者根据特定的题旨情境，结合自己的言语经验和审美经验，在简约的言语形式中，发现了繁丰的修辞信息，或者说，当接受者以自己的经验，补足了给定修辞话语的省略信息时 从“言约”向“意丰”的转换 才成为现实。

### 3) 错误表达 需要接受者纠偏

以上我们讨论的问题，都以正确表达为前提。但在实际的

① 参见朱玲《简约的话语 繁丰的信息》，《语文知识》1989年第2期。

言语交际中，并不是所有的表达都是正确的；也不是所有的非正确表达，都会造成言语交际受阻。如刘心武小说《班主任》中的直接表达者宋宝琦把《辛弃疾词选》说成《辛家车的词儿》间接表达者刘心武明知“辛家车”是“辛稼轩”之误，却故意效仿，造成修辞上的飞白，而作为直接接受者的班主任，和间接接受者的读者，都能正确破译。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来自沙叶新的小说《告状》：一位名叫杨鲁的孩子，告他父亲杨庆的状。他极其认真地向父亲所在工厂的党委书记指控，说父亲不让儿子“游戏人间”，每天“画地为牢”，要儿子“咬文嚼字”，“稍不满意，还要‘入室操戈’”。他声称父亲打他总是“重于泰山”，不像母亲打他“轻如鸿毛”。他指责父亲把他打得“犬牙交错”、“抱头鼠窜”、“屁滚尿流”，并且表示“庆父不死，鲁难不已”。孩子有限的言语经验，使他不明白汉语成语具有大于字面意义的整体性特点，当他依靠成语的字面意义来进行表达时，便制造了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但这种错误表达，没有产生负性接受。因为接受者的言语经验和知识积累，帮助他进行了瞬间的语义识别。接受者明知其错，却故意顺着错误的表达，准确地把握了必要信息，从而使言语交际中的消极因素——错误表达，在接受环节转化为积极的修辞效果。这些现象表明：在特定的接受语境中，接受者可以使看似不能成立的言语交际顺利完成。

#### 4) 未然表达 受接受者潜制约

完整表达、省略表达、错误表达，都是完成时的，属于已然的表现。但这并不意味着表达绝对地先于接受。表达在前、接受在后的逻辑顺序，掩盖着一个不为人注意的事实：在表达开始之前，就潜在着表达者对接受者的期待。问题也可以从反面得到证明：当一个人自言自语的时候，他的言语活动常常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不考虑意义完整、逻辑严密，不重词语推敲、句式选择，

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地从表达者口中流出，而表达者同时也是接受者，只是以显在的一个人，内化为隐在的两个人，以表面上的“独白”遮蔽着心灵中的“对话”。由于表达和接受同为一个行为主体，不存在不同交际者之间的语言距离，<sup>①</sup>不需要为缩小语言距离而选择语言手段。但是，一旦表达和接受产生了角色分化，便意味着表达者和接受者之间可能形成语言距离，进而产生表达者缩小语言距离的努力，如考虑接受者的认同心理、认同程度，或抗拒心理、抗拒程度，接受者的文化素养、兴趣爱好、性别特征、年龄特征、职业，以及携带修辞信息的语言单位以何种形式出现，更利于接受，接受者具有怎样的语言理解能力，接受者与表达者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语言环境等等，这些固然可以理解为表达准备，但是如果无视接受者的存在，便无需表达准备。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修辞活动之所以产生，正是表达者重视接受者的结果。由于接受者的潜在干预，使表达者在产生表达行为之前，往往先考虑表达效果，并选择相应的修辞手段，以获取预想的效果。中国有句俗语：“不要抢着说，而要想着说。”“想着说”体现了中国文化清醒的理性精神，因此作为一种行为准则被提出来。但是从修辞学的角度分析，“想着说”反映了表达者对接受者的高度重视。即不能信口开河，而必须深思慎言，以免言之不妥。这里，接受者赋予表达者以某种程度的规定性，并在某种程度上预设了未来的接受。

## § 1.5 简单的说明

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分支能否建立，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

<sup>①</sup> 关于“语言距离”的详细分析，参见唐跃、谭学纯《语言距离——小说文本分析的另一个视角》，《文艺理论研究》1989年第1期。

度上获得相应理论的烛照。接受修辞能不能由昔日的灰姑娘变成皇后，取决于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证明她的价值。因此，本书的写作，将是一种艰难的跋涉。

本书将借鉴接受理论和接受美学，但决不意味着会是后者的拙劣翻版或机械图解。以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的接受理论和接受美学，跟本书构想的接受修辞学，仅仅在理论上同源。同出一源的理论活水，流入不同的河床，必然产生理论自身质的规定。同时，本书以汉语修辞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人的修辞接受方式、接受心态、接受规律。它有着中国人在话语理解和精神沟通中所体现的灵性和文化模式，反映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审美心理。

本书取证，以修辞信息丰富的书面文学语言为主要对象，也附带涉及：

a) 口语修辞接受

b) 以动作——表情符号、或音响——画面符号为伴随因素的话语修辞接受

c) 利用字形、图形、标点符号等增强交际效果的非语言手段修辞接受

以上三类修辞现象，跟单纯的书面文学语言给予接受者的刺激不同，引起的接受反应也不同。本书不回避对这类修辞材料的分析，以及对这类接受现象的理论阐释。这种阐释，将从对于修辞接受诸构成要素的系统分析开始。